

少年游

(一)

(本文插圖刊第3、41頁)

丁 驥 (英國格拉斯歌大學博士，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教授)

直奉大戰父親失業

一九二五年(民十四)十一月是我首次讀報紙之年。以前我見到報紙，就如家中傢私一樣，天天見面，却無研究它的興趣。那一天偶然翻開，看見橫列的大字標題，每個紅字，足有一寸見方，一時好奇，讀了大字，又看小字，再把內容仔細念念，原來是郭松齡倒戈，殺得奉天張作霖狼狽不堪。小心中希望奉張垮台。因為年前直奉之戰，吳子玉佩孚戰敗，連累父親失業，幸得安全由山海關退回。故視奉張為敵。關心郭松齡，因此天天必看報，一直到郭松齡夫婦被殺為止，雖甚惋惜，却也使我關心國事，成了讀報紙的成員。

那年父親受林虎、洪兆麟之邀，代表他們再去北京，出席善後會議。會議雖然無所成就，父親却因此受段祺瑞之聘為執政府簡任秘書，住在北京。接了祖母前去居住。次年初，父親來信要我們全家北上。原因是祖母去年夏天病逝。要我們去好開弔、出殯。來信未言，但是祖父似有預感，堅不肯去北京。一人帶了我的終身丫環來喜，回老家雲南曲靖去。我則與二叔嬉及他們的長

子香生三叔一齊乘船北上。經過上海時，天降大雪，我還穿着夾衣單襪，脚也凍得骨疼。由上海到天津，船是一路敲冰而進。我們南方人這是第一次見雪，海水浮冰也是奇景。到北京時，住在魏鬧胡同。母親請了醫生，用藥酒洗脚，才把脚醫好。也因此母親十分不滿二叔嬉，說他們不關心她兒子的身體！

祖父回去的老家是曲靖。在南門有祖傳巨宅，內有一井。據說是縣中龍井，井水甚甜。父親幼時手植柏樹一株，後來父親在家中病歿，正是中共文革之時，幸虧此樹，他才有棺木(一九六九)。我對祖居，他無所知。從未回去過。想今生也不會見到的。

到北京不久，二叔與父親大爭吵，緣因是日本提出無理要求，而段執政似乎要屈服，引起學生大遊行，到執政府去抗議。執政府門前有一照壁，兩端有旁門，進去有一廣場。當中才是大門。當時已有軍警保衛大門，阻止學生進入。兩個旁門却被人羣擁進。加上學生騎的自行車，把旁門塞起來。及至衛隊開鎗，裏面的人逃避無門，跳牆逃，因而摔傷的，奪旁門而出，因而踐踏死

傷的都有。二叔去得晚未曾進門，故得生還無恙。這就是出名的三二八慘案。父親在執政府做官，而二叔參加請願，故此意見相左。父親說二叔既非學生，參加擾亂，沒有理由。又說學生不應干涉政治。二叔說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政府賣國，豈能不管？二人吵了一下午，大概都累了，方才平息。從此二叔就不喜歡北京，後來終於帶着家小回雲南老家，自謀生路去了。段執政也因三二八慘案下台。父親失業。

二叔在北京之時，給我的影響很大，以作文為例。祖父教我時，作文必有起、承、轉、和四階段。而起句最費心思。我記得祖父最喜歡的是平頭並起格。例如「吾不敢謂世人皆白也，亦不敢謂世人皆不白也」。以下就是白就怎麼樣，不白又如何如何。

父親教我時比較有新思想，不過仍出不了呂東萊博議的那一套。如「荀子言性惡，孟子言性善，夫人之生性也不……」

二叔教作文起句是：「概自歐風東漸……」無舊八股，但有新八股。在香港時我的國文除了學校家中，雙管齊下之外，還自己讀了商務印書

館所辦的函授學科「國文」與「代數」一天上三種學校。白天在聖士提反中學，晚上在青年會上夜校。週末在家做函授學校的功課。故喜歡寫作。到北京後我一人住西廂房，每週自己出版一份家庭報紙，叫什麼櫻花週刊，上有家庭新聞，小說，詩歌，愛情小說之類。那些感情都是卿卿我我，我想像之作，愛真是純潔得很，人是赤子之心。

我一人編，一人寫，貼在牆上。父親不知，三叔不看，只有二叔每次必搬一椅子，坐在報前從頭到尾的讀。有一次他看過之後，我適在旁邊，他說：「你寫的，編的都不錯，不過文章不只是長恨歌就算。你應該多看一點新文學才行。」我問他什麼新文學？他說如易卜生的戲劇，屠格涅夫的小說……我也從善如流去找來看，可惜那些譯本，真是咬牙切齒。尤其是其中的人名，不是「斯基」就是「洛夫」，看來生厭。我說給他聽。他就給我一本侯曜寫的「復活的玫瑰」。

此劇本讀後令我三日三夜，不思飲食。一個純真的心，突然認識了醜惡的事。真是血在沸騰。我的思想起了劃時代的變化。寫作也由文言，變成白話。二叔成了我的知己。所以他走後，我就十分孤寂。後來一九三三年時我準備投考公費留學，特別寫了一篇英文作文寄給他看，請他批評。那篇文章自以為寫得精采。題目是「西伯利亞之雪」。完全是一篇幻想的文章，頗有詩情畫意。誰知他回信，把我罵了一頓，說「一頁之上，有十幾個文法錯誤，這樣的英文，還想留學，簡直是做夢！」因他之罵，我投考之時，把英文作文寫得短小精簡，用的是短句子，又前後細讀四

遍，把文法錯的一一改正，果然得到高分。他未想到他的罵對我有如此的功效。可惜我回國之年，他在台兒莊之役殉國，沒有再見過他。至今連遺骨都未找到。

戰亂連逃險遭禍延

一九二六年夏天我父親要我和三叔進學校讀書。兩人以同等學力，同去投考北京東城一家鐵路大學。（校長關廣麟，校長原稱畿輔大學）

我年小，身短。校方主持人說我應去中學讀書，我執意一試。所以特別准我一人在教務處應試。國英文二科試後，他們大為驚異，允我上預科一年級。班上同學全是老大哥。他們對我這「小孩同學」特別喜歡。知道我喜歡寫作，同學王玉振、牟輝明，都送我紙簿。有位胡應泰特別請我大替我訂了一本簿子，布面精裝說是供我寫詩之用。有一位憚寶玉自己說他是賈寶玉化身，把同班同學都賜封為紅樓人物，叫我為賈蘭。此時不喜聽課，上課時坐在最後面，自己寫東西。考試時抄書。我還編了一本「抄書大全」。列舉抄書之法。讀者或有高於此道的也不一定想出我的妙法。例如把書桌抽屜的底打去一半，置書其中，抄時由空洞滑下，置之膝上。先生來時，叫我站起來，則把書一送，已回原位，站起來也找不到夾帶。後來學校發見桌子底都爛了一半，密查之下搜到一本抄書大全抄本。却查不出是誰的著作！學校舉行國文比賽，題目是「邱濬議××太學法……論」我雖不知邱某何人，太學法是什麼，我的文章却中了第六名，受到關校長的獎狀。憑

良心說抄書是不必要的。要知道在那裏去抄或要做好夾帶，你必須詳讀課本，倒不如好好預備，事半功倍呢。

校中有學監一人是一位老夫子。上課時他來巡堂。這一天他忽然停在我桌旁，摸摸我的頭說道：「你是個絕頂聰明的孩子，書要好好的讀，不然你的聰明才智都白費了呀！」他的話當時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了不得。一會兒教務處人來人往，騷動異常，我也去看熱鬧。原來學監回到辦公室，忽然倒地不起，就此長眠了。他向我說的話，正是他最後的幾句話了。從此我一變而成了好學生。所以後半年，我也學了一點知識，尤其是法文教師周先生，一再稱讚我後來居上，考了第一。可惜上半年對數、理、化三科一無所知，下半年完全聽不懂，無可補救。這三科後來全憑自修，祇取其結論應用。

一九二六年吳佩孚東山再起，革命軍北伐，以破竹之勢，統一了長江以南的地區，吳氏終於敗退。父親曾做過一任鄭縣知事，短短的幾個月，奉軍入鄭，雖仍委父親為縣長，也只是暫時維繫人心而已。父親送祖母靈柩回真安葬，又捲入了雲南的內戰。龍雲與胡若愚相爭，龍勝胡敗，二人都是父親的舊識，父親主張和平，為胡所忌，曾派刺客數人，到曲靖老家欲殺父親而未果。因此，父親又回到北京，友人張汝驥為龍雲所殺。此時北京為奉張所據，自號大元帥。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張命軍警闖入東交民巷蘇聯使館，逮捕了藏在那兒的共產黨首領多人一律處死，李大劍為首。那晚我家中住着一位父親朋友的親戚，忽然

大發神經，跪在天井之中求上天保佑，一面燒書籍、紙張、信件。我們從火堆中取出的紙張，看出那是共黨的文件，反而幫他燒得一乾兩淨，連夜把他親戚找來，送到天津去了。事後母親怪父親太容易受朋友的騙，幾乎禍延我家。張大帥只殺共黨，對國民黨寬容是實。

投考輔大竟然高中

一九二七年夏天，我去投考新成立的輔仁大學，因為數、理、化不懂，而輔仁也只有文科，所以就報名西洋文學系，竟然高中。我由預科一年，一躍而入本科，也是憑國文、英文成績特優之賜。

輔大為天主教辦的，似與其他天主教學校屬於不同的教派，教師為神父，大都來自美國。校長陳垣字撝菴，是我們史學家，專門研究回曆。中國教授多是北大的，來此兼差，所以我們也等於北大的程度。劉半農、沈兼士、朱希祖等都教過我。教務長是美國神父奧固爾，他是遺傳學家，據說曾發表文章說進化論之不當。他也教我們亞里士多德的論理學，又教莎士比亞，他最喜歡我，每次發問，同學答不出就叫我答，一定不錯。我在輔大兩年，學了希臘文學、拉丁文、十九世紀詩、小說等等。這些文學作品，英文不夠，學來如豬八戒吃人參菓，能背能誦，却不甚了然。我一向喜詩歌與戲劇，只是覺得寫劇本難，寫詩易。自己作了一本詩集給人看。有位同學學問很好，我問他的詩集向無名字，你能否給我寫一個？他不假思索地說：「落花流水集」，說好

的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說壞的是「蓮花落，稀里華拉。」

進輔大不久，父親決定棄政從商，受好友項松茂的邀請，替他到四川開辦五洲大藥房重慶分店。提及此藥房，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它與商務印書館齊名，是華資經營，自己有化學師製造許多日用品，尤以固本肥皂出名，抵制日本的肥皂，故日人最恨項松茂，也是他後來被日軍慘殺的原故。

父母親同弟妹們一齊去重慶，只留下我與三叔二人在京，時革命軍已入北京，改名北平。三叔與我遷居雲南會館，中國各省在北平都有大大小小的會館，有些二省之外尚有某縣的會館都是當年在京供職的達官貴人集資所建，目的是幫助同鄉，多少有救濟之意，平時會館也是集會之所。有些地方經濟情形特好，故有專門一縣的會館，如靈石會館、江寧會館之例。我們雲南也有兩棟，一為家眷住宅，一為學生住宅。想當年此中必會住過進京趕考的舉子，不知有多少歡樂，多少嘆息。有些死亡在北京的，棺柩尚留在會館之中，故會館一部成了鬼宅。我住的學生會館趣聞甚多，都載在我寫的「旅平外史」小說之中。

革命軍來時聲勢浩大，我在驟馬市大街常看見國民黨市黨部的小汽車開來開去，裏面男女皆有。父親在京時，已經命令我們讀三民主義，還要寫讀後感。我的是「孔子與中山」，後來發表於大公報文學副刊。天安門常有民衆大會。廣場之中搭了一台，有人輪流在講演，聽不甚清。記得有白崇禧、顧孟餘、徐謙等。每次宣傳列車運

來大批道林紙精印的宣傳品，在北京贈閱。我也去拿了好些。對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的言論非常欣賞。那時凡是公共機關照壁之上必是藍底白字，寫了三民主義中的某段某節，以為座右銘似的。由火車站到輔大必經方振武的司令部。他門前的照壁上就抄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那一段。這對我印象最深，因為我懷疑國父孫中山先生這句話是否真是那樣簡單？另外兩句常見的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黨權高於一切」。

走向反抗政府之路

我升入輔大二年級時，三叔已去鐵路局工作，不再在會館住。我雖留了一間房，却搬到學校宿舍。輔大是和尙廟似的，晚上八時上鎖，遲了回不去。食飯則在校外小館，大約八分錢可以吃飽。（一角換二十二個銅元，十個銅元為一吊，一斤烙餅有兩張，一吊錢；一碟炸菜肉絲也是一吊錢，故一頓飯不及一角。）夜間九時熄燈。我住的那間東廂房很乾淨寬大，外廳住的是兩位神父。我與另一同學則住內間，這位同學喜歡讀「玉梨魂」，也寫章回小說。他那一段：「男的騎自行車至牆，下車險牆而過。」我說如此，你的自行車不會不見吧！他出門騎自行車，寫小說也自我中心，把車寫進去了。

輔大用的是前清的睿親王府。對面過一小溝是恭王府，傳說此二府就是紅樓夢賈赦及賈政的家。我們住的也許是秦可卿的私宅。那時我不會讀過紅樓夢這本書，故沒有考過古。恭王府外有些矮屋是當年府中守衛所居。此中尚有人住。同

學徐漢光的未婚妻一家，就住這樣一所。只有兩房一坑。有一夜出來不及回宿舍，就在他家借宿，父、母、女兒、我和徐君同睡一坑，乃是首次經驗，長幼男女同宿，有些不慣。

這兩年來中國的文藝日新月異，浪漫派、頹廢派、未來派、唯美派的小說，戲劇詩歌，出版了不少。新書天天有，雜誌甚多，如創造、幻洲、新月等等。商務文學研究會的出版物已經過時，代替的是一些五花八門的作品，作家如魯迅、周作人、郁達夫、章衣萍、王德清、郭沫若、張資平等可以說是人才輩出。我喜歡詩，收集了一大批中國新詩集，如胡適的「嘗試集」，宗白華的「蕙的風」，都是孤本，甚為難得。聞一多的方塊詩也才上市。徐志摩、陳夢家、方緯德的也有。音樂則處處是徐錦輝的小調。彈的是大正琴（日本傳來的）。陳、方二位還替我修飾詩句。

沒有多久，大批翻譯作品上市。中國文藝運動似乎一年不到，就過了十九世紀的浪漫時代，進入了一個唯心唯物的爭論時代。政治書籍大批出籠，學子們以讀翻譯小說為習尚。尤其是俄國小說。嚴肅的書有托洛斯基的「文學與革命」。有恩格斯的社會進化論，有倍倍爾的「婦人與社會」。當然浪漫派並未絕響。梁實秋的「巴比特與人文主義」，林語堂譯的一本文學思想的書（名字已忘），是針對梁氏而發。在社會學方面，介紹的莫爾根「古代社會」，為機械進化論張目。一年之內中國思想的潮流已進入二十世紀，而且非常「左」。戲劇方面，田漢後台在寫，前台在演的獨幕劇甚多。熊佛西也寫了一本「屠戶」，

這些都引導青年走向反抗政府的路上去而不自知。我搜集的書，全部在蘇州寄存在李根源（印泉）府上，後來為日軍所焚。不但這些新文藝，連我舊藏的碑帖、字畫也一掃而光。此已不是第一次我受損失。在輔大讀書時，搜集的英文名著，有些十八世紀的初版本，曾被人全部偷去賣到東安市場，那是第一次。最後一次是由大陸逃難，一切書籍、稿本都丟在南京，被中共「接收」去了。之後曾有十年之久，發誓不買書！中共拿了一本「中國地形」稿，經我再函索，他們說是人民的財產，不能給我。所以我在港另寫一本，張曉峯先生替我出版的。

一夜之間成了英雄

一九二八年羅馬天主教會在北平新建一道明大學，破例招收男女學生，輔大當局頗受威脅。道明初辦，校舍都是新建的，學生比輔大多了一倍。當時北平大學不下十餘所，以北大、清華、燕京為首（專科學校不計）；次為男女師大、輔仁；再次為中國、民國、平民、鐵路等大學，還有一間朝陽大學，以法科馳名。一間孔教大學。學生多投考北、清、燕、師，如考不上即用輔仁、道明、中國、民國為後盾。

道明男女同校，也是它的學生多的原因之一，但也是它的致命傷。開辦不久，因男生夜闖女生宿舍。據說是爬牆過去的，被舍監修女捉到，當即開除。不料他是學生會主席，擴大題目為反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引起學潮；不但調停無效，學校又大批開除滋事之人；他們告到市黨部去

，市黨部派人抗議無效，談判決裂，就出一紙封條，將道明大學封閉。當時革命初初成功，黨權真是高於一切，市黨部說封就封，教育部也不能改變黨的決定。道大校長受教皇之詔，返梵帶岡覆命。在西伯利亞途中，以腦溢血死在車上。從此更無人出面支援，道大因此永遠消失了。

那些滋事學生忽然「失校」，市黨部怕他們羣龍無首在外生枝節，故把原校學生組織「中山學會」，為民衆團體，直屬市黨部，一面促他們辦理轉學。北、清、燕、輔仁是按章不收，要收也要經過入學考試及格才行。故此大批學生，轉入中國、民國、平民等大學去了。

那年不知什麼紀念日，在天安門開民衆大會。中山學會也整隊參加，為首的人高舉會旗、黨旗、國旗，身配徽章。有些手持號筒一路領導呼口號，隊伍是女生在前，男生在後，凡百餘人，衣裝一律，甚為壯觀。我是觀衆之一，不由得羨慕，就想入會為會員；恰好我同班同學徐漢光的未婚妻本在道明讀書，她是會員，老徐要加入，就連我一齊報名，手續簡便，我二人各得徽章一枚。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一個大規模的組織，深以為榮，所以配了徽章在校內走動。老徐心血來潮，要在輔大組織學生會，寫了一張大字報貼出，贊成者簽名其上。我本來不贊成，因為輔大與道明不同，半數同學都是教會資助來的清寒學生，有些已經是教會的神父，他們鑒於道明的失策，斷不會贊成的。我雖未簽名，却因佩戴徽章，在校中「招搖」（他們的措詞），為校方所注意。校長奧固爾召見我，英先生千里任翻譯。他說我

年幼無知，一定是受人鼓動，參加了這搗亂的團體，要我退出中山學會。他這種說法，傷了我的自尊。因為我之加入，乃是自發的。中山學會也不是以搗亂為目的。我指出我一向景仰孫中山，以大公報發表我的文章為佐證。他又退一步說，要我在校中之時，不要戴學會的徽章，我說這是我的自由。輔大如有校徽，我也一樣佩戴的。」他仍不滿意，就說「如此我只好把你開除學籍了。」

由校長室出來，徐漢光早已把一些同學集中在外等候，都問我這是什麼回事，我當然把真相說明，於是又引起了許多人簽名要校方收回成命。我的老友徐漢光，見中山學會引起此動亂，向上面報告，次由市黨部派滕珂、鄧亮兩位幹事到輔大見校長。美校長不見，由中國校長陳垣接見。滕同志是湖南人，脾氣甚壞，在校長室拍桌子說：「你們如不收回開除之命，我們就封你輔仁大學！」陳校長做不了主，還是奧固爾答應說：「丁某本是年幼無知，我們不過試試他而已，不過他與我談話之時不尊敬我，必須他向我道歉才行。」這時由英千里先生來向我說：「不要把事弄大了，大家不好，你只要向奧固爾先生說一聲“Sorry”，握手就行。奧先生一向最喜歡你，視你為自己的子弟一樣，他這樣做自己心裏也難過了一夜。」

我同英先生一齊去見奧固爾，相視良久，我才伸手出來說：「很抱歉」，他立即伸手握住我手，淚珠幾乎滴下來那樣。如此我仍在校中，仍舊掛着徽章，組織學生會的事，不但大家要我起草

組織法，而且推我為臨時籌備會的主席；中山學會也推我為副主席，一夜之間成了英雄，有些莫名其妙！

學潮平息離開輔仁

老實說，我確是年幼無知，為人利用。同學徐君是什麼來由我不知，但他認識一位陳鐵心，是道地的國民黨。在張大帥之時，他曾被捕，因為他說愛一位女作家名叫冰心，故取名鐵心。當局以為他是講戀愛的混小子，不會是革命家，就把他放了。徐君的未婚妻在道明，同她最要好的朋友，就是那位夜闖女生宿舍男生主席的對象。徐君不久之後，忽然消失了，至今不知他生死存亡。因為這些蛛絲馬跡，今日想想，我之出來作領導，未始不是他們的妙策。

我們學生會果然組成，但是所選的主席、委員全是教友，我們籌備委員，無一上名。因此又引起了少數派與多數派的爭執而罷課，我是少數派領袖，我向奧固爾校長說：「看情形我必須退學了，請學校不要阻止同學轉學他校的行爲。」這樣我們一羣三十餘人，全體轉學他校。在校外組成另一民衆團體稱爲：「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委員會」，隸屬市黨部，我任主席。後中山學會主席又因桃色糾紛辭職，我被推為主席，所以這一年我是天天見報的人物，會館門口的黃包車夫都認識我，每天我一出門，個個搶着來拉。他們都知道我是「到市黨部辦公的主席」。我雖轉學中國大學，一直未去上課。考試之時已先知道考題，寫好去交卷而已，只有英文一科是一位外國太太教

，她說：「我不會看見過你上課，怎麼你會來考？」給我一個不及格。在中國大學遇到一位同學張堯年，他是「名學」專家張子和（北大教授）的公子，後來一同到燕京，一起留學英國，同時在重慶，同在香港，又同在美國，做了六十年的朋友。

我本無打倒輔仁之意，所以雖身兼二會主席，又得到黨部及北平學聯會的支持，我主張向輔仁當局提出改善方案，避免寓宗教於學的事。故提出十數條件，今日不復記得，其中一條是教自然科學，要提進化論，不能用上帝七日造世界為地理第一課；一條是學生自由不能受宗教教規限制，教友不在此列，仍應聽其自主；一條是集會結社自由，學校不得干涉；一條是改輔仁大學為男女合校；一條是課程中應加三民主義一課……這十二條由我代表兩個學會向教部特派員朱經農先生提出的，經學校接納，學潮就平息了。

此時汪闊合作，北平市黨部被代主委周學昌接收了。周的第一道命令是解散兩個民衆團體，中山學會首當其衝。黨部公函上說：「……該生等……」我藉此為詞，面見主委周學昌說：「我們是民衆團體，難道黨部不要民衆？我們也不是周先生的學生，何以行文稱我們為「該生」等，這樣公文我們不應接受，故來退回。」周先生也不答覆，只言送客。過了幾日，忽有軍警到會館我的住處搜查，並帶去問話。他們搜到一本「馬克思主義淺說」及大批宣傳品「北平民衆」，問我如何解說，我好笑向他們說：「那本『馬克斯』是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我從圖書館借來看的。」北平

懷馨香

孟 瑤

馨香與我，是同年進入中央大學的，她學法律，我念歷史。

抗戰時期，各大學遷校後方，倉卒中，不能攜出的圖書儀器很多，但有一份報紙却畫了這樣一幅漫畫：當師生都已上船後，羅家倫校長又神色匆匆地要登岸，人家問他什麼事？他說：「不行，學校裏還有一只燈泡沒有拿來。」這是說，中大遷校，是一無損失的。到了四川重慶，承沙坪壩重慶大學的慷慨，將後面一大片山地借給了我們，於是蕪路藍縷，忙於建校。用竹片稻草泥巴作牆，黑瓦作頂，幾天就蓋一座教室，一所餐廳，一間宿舍。就在朝陽拂曉霧，明月照松林的美麗環境中，我們弦歌不絕。那時學校名師如雲，我雖空入寶山，馨香却是滿載而歸的。

我們住在一間大宿舍，數百名女生擠在一起，木製的上下舖，五張隔成一間小屋，却相互遙望，一覽無遺。馨香與我就同住在這間大宿舍裏。我們吃在一座大飯廳，數百名男女同學一起會餐，竹桌竹椅，竹椅多半不久失蹤，我們站着吃了四年「八寶飯」，馨香與我，就是在那飯廳裏一起用餐。四年，洋溢着青春煥發的四年，我們幾乎朝夕相處。這用艱辛與歡樂結成的友誼，自是非比尋常。但畢業後我們

各奔前程，許久，我們都沒有再見到。只是，我們之間的緣份不淺，在台灣，那久已失去的同窗之情，又聯繫上了。除了開女同學會外，我們還常有見面的機會。

馨香服務司法界，由於公正廉明，從而獲得了大法官的最高榮銜，她在事業上的輝煌成就是世人皆曉的。但是她的篤於友情和熱心公益，却值得特別一提。

那年我出國，由於英文名字拼法舛誤，引起諸多困擾，必須由法院公證，我找到她，她在百忙中抽暇。由於她的協助，在偌大一個衙門中辦理繁複手續，只半日便諸事妥帖。這事，使我至今感激。

中大女同學會是每年舉行的，奔走最多，出力最大的是馨香，她使我們女同學常常見面，更增親密。今年五月，女同學會循例舉辦。我去了，她正守在簽名桌前，她見了我，笑着說：「你在台中，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為什麼不來？」我拍拍她的肩，都親切地笑了，半天半天。開會時，她坐在主席台上，她的衣着永遠那樣整齊，她的臉上永遠那般和藹。我的座位很前，不時向她望去，她也不時望過來。但是，誰能相信，這就是我們最後一面？從此天人永隔？

七十六年十二月八日

民衆」是市黨部頒發給我們的，我無處放，故堆在床下，也可避免潮氣。還有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餘的書是去年宣傳列車到天安門時發下來給民衆看的。」

他們尚能通情達禮，尤其是汪閣正在合作，這些書對我有利無害。當即放我回家，只是書都沒收了，害我賠圖書館一本書價而已；其他西文書籍、小說等等並未取去作證據，所以尚完全無恙。只是他們不識洋文，我那三本英文「資本論」他們不曾拿去，不然大可作文章了。

是年秋天我與張堯年同去投考北大、清華、燕京。北大是國文不及格，清華是邏輯學不及格均未錄取，燕京雖准轉學入二年級，但要讀一年級的英文。

邏輯學一科，我在輔大全班第一；考清華時，以英文命題，對我好，故一味專心作答。不料別的考生，都不會答，因此要求監場講解題目。因為他們學此科時用的是中文本，有些竟然走過來問我題目怎講，其中有一位小姐，我記得很清楚是歐陽采薇。監場是註冊科的職員，一看考場情況，採取斷然措施，請我出來解釋題目，我也樂為之。不料此科竟然不及格，進不了清大，後來在燕京時，到清華旁聽文學史。歐陽小姐也在班上，有好幾位都認得我，說及此事，他們都不相信我不及格！歐陽小姐在清華很有名氣，因為她的老師文采風流的吳宓（兩僧）對她十分眷戀，一時傳為佳話。實則歐陽見到同學，必是笑臉相迎，男生未免自作多情而已。

（未完待續）